

# 边缘生态·民间智慧·世道沧桑

## ——论《天眼》的境界独特性和内蕴丰厚度

刘起林

(华南理工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彭见明的长篇小说《天眼》选择湘楚民间的相术文化及相关社会生态正面写实,既趣味盎然地描绘了一种底层社会的边缘性风俗画卷,又深刻地参悟和阐释了民间相术所包含的处世境界和生存智慧,并以此为基础洞察世事沧桑和人心善恶,其中体现出创作主体以民间智慧“拯世”“渡人”的精神意图。小说由此显示出既具境界独特性又具内蕴丰厚度的艺术品质。

[关键词] 《天眼》;相术文化;边缘生态;民间智慧;世道沧桑

[中图分类号] I207.4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2)02-0025-04

### Ecological Edges, Folk Wisdom, Vicissitudes of Life and World

#### ——Comments on Peculiar State and Deep Connotation of Eye of Heaven

LIU Qilin

(School of Journalist and Communic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Peng Jianming's full-length novel of Eye of Heaven chooses physiognomy culture of Xiangchu and its positive realistic of the particular society, which not only describes the image of marginal custom with interest, but also deeply understands the state realm of dealing with affairs and survival wisdom in folk physiognomy field. Based on these, he observes changes in the world and human's good or evil which reflect the creation subject of salvation and saving people with spiritual intention of folk wisdom. This novel shows both the quality of special realm and deep connotation.

**Key words:** Eye of Heaven; physiognomy culture; marginal ecology; folk wisdom; vicissitudes of life and world

早在20世纪80年代,彭见明即以《那山 那人 那狗》《大泽》等作品著称于中国文坛,90年代后,他的创作明显表现出以追求审美独特性的创作主旨,坚持一部作品一个题材领域的创作思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正如他自己曾经明确谈到的:“我孜孜以求的、苦苦寻找的是:我的作品中,有多少自己的声音(能够区别于他人的声音)。”“在每一件

新作中的众多文学要素里多多少少提供一点更新自我(且不说超越)、给人耳目一新的东西”。<sup>[1]</sup>继90年代中期的《玩古》借玩古这一民间消闲文化时尚对世相民风的独到体察、新世纪之初的《凤来兮》由婚外情故事对人情冷暖的洞烛幽微之后,彭见明200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天眼》又在追求审美独特性方面令人耳目一新。

《天眼》竟然选择了“相术”这一被长期视为“封建迷信”的社会生态作为创作题材。在当代中

收稿日期: 2011-11-15

作者简介: 刘起林(1963-),男,湖南祁阳人,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国,无论是社会文化整体格局还是民间社会,相术、巫鬼之类的“封建迷信”活动,都处于非主流的、被遮蔽和被摒弃的边缘状态。虽然新时期“寻根文学”的“复魅”叙事,曾使各类民间神秘文化的审美和精神意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展现,但在时代文化整体格局中,其边缘性的定位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彭见明的《天眼》却采用正面写实的方式,来探寻湘楚民间的相术文化,题材选择本身就显示出巨大的审美独特性和艺术探索性。更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作者不仅从底层社会边缘性风俗画卷的角度,趣味盎然地描绘了民间相术这一在当代中国鬼祟、乖戾却始终顽强地存在,甚至也被社会各阶层人士内心普遍认同和依赖的文化生态;还对民间相术所体现的处世境界和生存智慧,进行了精神文化层面深刻的参悟和阐释;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视角,既洞察世事沧桑和人心善恶,又包含着一种以民间智慧“拯世”“渡人”的精神企图。

于是,《天眼》在从容平和、若巧若拙之中,显出别致幽邃、锋芒内聚的艺术风姿,审美意蕴超越了一般民俗小说就事论事或搜奇猎异的境界而变得丰富和深厚,作品的精神气象也摆脱了因独特而步入怪异的可能性,显得稳健、正大起来。

## 二

《天眼》以民间相术为审美观照对象,展现了一个隐秘、独特而多姿多彩的边缘性社会生存空间、一种别有意味的民间生存样态。

作品以相术高人何了凡、何半音父子的人生轨迹和生存状态为叙事中心和情节线索。作者广泛地展示了他们的学艺过程、谋生方式、日常生态、江湖名声、看相奇遇等各个侧面,而其中着重突出的,当为何氏父子对于社会“主流”生态和“正统”人生模式的疏离。何了凡在那整个社会都认为干“革命工作”无比神圣和光荣的时代,却觉得学算命来神而做工人乏味,懒散、敷衍到最后,只好辞职回乡了事。何半音明明头脑灵泛,但在似乎最应该规规矩矩地接受老师教育、热热闹闹地在学校里玩耍的年龄阶段,却是看闲书、跑江湖如鱼得水而上学校总是心神不宁,最后也只好呆在家里,自己找旧书、破报纸闷头钻研。改革开放,时来运转,他们由山乡进县城生活,却拒绝有利于看相生意的繁华路段,偏要在老城区的流星巷深处找个出租屋来安顿,方觉“塘大水深好养鱼”……凡此种种,均体现出何氏父子一副安乐于边缘性社会生存空间,如《庄子·秋水》篇所说“曳尾于涂中”的“泥龟”式的人生

姿态。

围绕何了凡父子的看相测字生涯,小说还广泛地展现了相术文化圈的群体生态。从“寅斋公”、慧觉、本寂等专业相术之士,到秀妹子、心宜等深谙相术之道的女流之辈,再到刘铁、郭向阳、郭如玉等巫术的信奉、迷恋者,作者对他们的人生隐曲和命运真相,都进行了或正面或侧面的点染和勾勒。其中的描述重心,也是相术对他们人生的意义和作用。于是,一种以相术文化为价值资源和立世根基的社会边缘生态,以及其中所体现的“道中庸”但“实高明”的文化姿态,就被有力地展现了出来。“边缘性文化资源立足于异质的共存、多样的共生,社会与文化的‘他者’、‘底层’、‘弱势’、‘沉默的大多数’之中,也确实埋藏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和道义光彩”,<sup>[2]</sup>因此,这种审美开拓实际上是作家深厚的人文情怀的艺术表现。

## 三

在此基础上,《天眼》以“相术”这种边缘文化生态所包含的价值底蕴为基础,参世道、悟人生,由此揭示出一种深具民间智慧的人生境界与处世哲学。

以原始宗教观念为基础的传统巫文化及其相术之道堪称源远流长,而且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与儒、佛等文化的民间积淀相互交融,确实蕴藏着深刻的人生哲学意味。也正因如此,这种神秘文化至今尚在广大的民间文化领域占有不可忽略的一席之地。从何氏父子谨守相术文化的处世法则,得以洞明世相而自得其乐,他们隐逸于闹市、闻名于江湖,却始终自甘边缘,其中明显体现出一种历经世道沧桑而能独立自足的生存境界。众多相术圈人士,也均是依赖相术所隐含的价值观来作为心理的支撑和行为的基点,才能既泯然众人又独具慧心。这种相术文化所体现的价值观,诸多方面、种种元素凝聚到一点,就是作者借寅斋公给何半音取名所概括的“求半”。所谓“求半”,“是守本份,是知足,是随缘,是戒贪念,是拒奢华,是甘居中游,是不偏不倚”。其中既明显地积淀着道家文化知雌、守弱的处世哲学,又潜藏着佛家随缘、舍得、戒贪念的思想观念,还包含着草民百姓善良、知足、守本分的人生原则。

作者在《天眼》中张扬这种“求半”、“半音”的人生境界,无疑隐含着对人欲泛滥的商业化社会的深沉感慨,也带有明显的警示时尚性生存境界的审美意味。在作品中,即使是作者持基本认同态度的

人物,当他们一味痴迷于放纵自己的欲望、“人心不足蛇吞象”时,也会出现“反误了卿卿性命”的现象;当他们平和随缘而又谨守做人的底线原则,踏踏实实地与人为善时,好运则迟早会降临到善结“福缘”之人的身上。心宜尽管深通相术之道,但当她未能恰到好处控制自己的欲望分寸时,结果是间接地断送了何了凡的性命。郭向阳过度地痴迷于对心宜的爱情,终濒于疯癫状态,而他这种爱曾经以充分的善意和诚恳展示在心宜面前,最后也就换来了心宜在生活方面的照顾。刘铁在险恶、诡异的仕途中维持自己为官、为人的本性,受过大老板的提携,即不顾人事坎坷对大老板始终感恩守诚,从省城下放到了丁县,也同样本分做事、踏实为官,终因这世上毕竟需要认真做事之人而交得“好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从众多方面,将浮华奢靡的本寂和尚与低调本色的何氏父子进行了鲜明的对照,实际上是从相术文化人生哲学的持守者如何自我贯彻的高度,表达了自己的价值理念。

这样,一种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的社会生态所包含的文化底蕴与民间智慧,也就被作者真切生动而准确深刻地揭示了出来。这种关注与揭示,既是作家精神理想的审美呈现,也使文本具备了一种“思考性”的品质。“强化思考性可能正是提升精神高度的途径……许多优秀的小说都具有这种良好的品性。这是小说这一具象的、流动的、排斥逻辑方式的艺术的本性所决定的,同时也非常适宜于我们这个特定的处于文化价值重建的时代。”<sup>[3]</sup>于是,作家对于底层社会边缘性人生样态的表现,就不仅仅是基于温厚的人文情怀,而且还具有一种独特的精神深度。

#### 四

《天眼》还更进一步,从这种民间的生存境界和处世智慧的角度来“天眼”观人世,从而独具意味和深度地展示了当代城乡社会亦正亦邪的世道变迁和世态人情。

纵向审视历史沧桑是小说的一个重要方面。主人公何了凡父子的算命生涯和相术的历史命运,在这里成为了当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一面镜子。何氏父子的相术曾经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的“歪门邪道”,后来却堂而皇之地成为了芸芸众生裁决世事的心理依托;再到后来相术之风大盛,何氏父子虽隐匿陋巷却名声在外,以至守雌守弱、时刻防范,江湖险恶却避之不及。他们这种种有关相术的复杂际遇中,蕴藏着当代中国文化观念、人心善恶及其历时性

变迁的诸多意味。何氏父子与于长松一家的关系,也内蕴丰富地折射着当代社会的坎坷世道和历史沧桑。在50年代初的剿匪战斗中,何了凡舍命救回身负重伤的解放军政委于长松,从此两人互称救命恩人,“成为一段流传全县以至更远的佳话”,建国初期的时代风云和人际关系特征即隐含其中。文革时期,何了凡在于长松濒临绝望之际深夜探访,作出了他“没有完”、还会“官复原职”的预言;文革后,当于长松真的“一派得意的样子”时,何了凡又大煞风景地断言他“当个县长也就到头了”。这些流传甚广的“迷信段子”,实际上隐含着社会各方面对于长松等一代部队转业干部在不同时代环境里政治和人生必然处境的深刻洞察。进入新时期以后,于长松一家在了丁县已举足轻重,但每到面临人生关键性选择的时刻,他们却屡屡跑到身为草民的何氏父子这里,来寻求神秘的暗示和心理的支持,其中又显示出多少时代混乱与人心诡秘所导致的精神迷茫!这样以一个性格和命运独特的小人物来贯穿性地展示当代中国的历史道路,本是20世纪80年代“反思文学”以来具有深厚审美传统的创作思路,从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到陆文夫的《美食家》,从余华的《活着》到张宇的《活鬼》,堪称名篇佳作迭出。彭见明的《天眼》,让我们又一次体会到了这种叙事路径的独特艺术智慧和深厚审美潜能。

横向观照社会生态是小说更为浓墨重彩地表现的另一个方面。《天眼》广泛地描述了当今社会千姿百态的风俗民情画卷,并对其中光怪陆离的人际关系、人性欲望和人生价值观,进行了切中肯綮的剖析。生活场域方面,从大红山的十八里铺到了丁县城的流星巷;从名声显赫的阳山寺到落寞寂寥的阴山寺;从何了凡学艺的寅斋公那墙上贴满了报纸和字纸的破茅屋,到何氏父子从广州避凶回湖南的乡村公路和集镇,作者都以“浮世绘”式的笔法进行了丰富的展示。人际关系方面,作者描述了何了凡与于长松超越社会阶层差异的友谊,刘铁与“大老板”摆脱成败利害算计的僚属忠义,郭向阳与心宜痴迷、信任和放纵兼而有之的男女情感,以及围绕广州的商场黑老大、省城的官场大老板和阳山寺的佛界大住持构成的商界、政界和宗教界诸多的人际矛盾纠葛。《天眼》以相术等神秘文化活动为线索,通过对这种种生活场域、人际矛盾的艺术反映,摇曳多姿而又意味深长地揭示了当今社会世态的丰富与复杂、人心的凶狠与质朴。

以小说对于阳山寺的描述为例,作者从名僧慧觉决定“重塑昔日大庙的辉煌”与县领导寻找“振兴贫困

县途径”的想法一拍即合,阳山寺“项目”启动写起,错落有致地展现了阳山寺从落成开光典礼、烧“头炷香”给菩萨拜年,到慧觉圆寂、观看慧觉“坐化升天”的录像带《佛光万丈》之类的重大佛界活动。随着这类情节的发展,小说对阳山寺的佛教人物也进行了精细的刻画。慧觉声名远播江南数省而神龙见首不见尾,但“大慈大悲大善大德大彻大悟”中“亦曾有大恶”。本寂作为一个寺庙的大住持,个人生活竟豪华奢靡至于长松心生“县长不如庙长”的感慨,还通过看相测字、送佛经书法、打造各种佛界活动等,为阳山寺和他本人赚取了俗界的广泛知名度。一个“很有头脑、很懂世情”,具有一整套功利算计和蒙世手段的佛家人物形象,就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妙云在阳山寺长久地精心服务后,突然卷款潜逃,而且她的住处与本寂的寝宫之间,竟然还有地道沟通,寺庙内部生活的本质也就暴露无遗。通过对相关人物生活的种种刻画,作者入木三分地揭示了佛界复杂生态的内在真相。而一个“烧头炷香”名额的竞争,竟然牵涉到大老板、于长松、关书记、刘铁之间的暗斗与官运,官场中那“不动声色的杀机和美好”,<sup>[4]</sup>也就通过与阳山寺的联系,而得到了独具特色的审美透视。

由此,佛界、俗界中亦正亦邪的各种生存景观,就都围绕相术文化活动这个轴心,在作品中得到了有声有色的展现,文本的审美意蕴也因此变得丰富和深厚起来。

## 五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坛,出现了不少描写市井和乡野细民人生的创作高手,涌现了大批描绘底层社会世态民俗画卷的精品力作。如果从创作意图和思想主题的角度区分,这类创作大致有如下几种类型。刘心武、陆文夫等作家主要从社会政治角度命题。刘心武的《钟鼓楼》《四牌楼》《栖凤楼》等长篇小说着力表现时代政治生活影响所形成的世相与人生,作者试图以对当代民众群落生态的呈示,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陆文夫的《美食家》《小贩世家》《井》等“小巷人物志”系列作品,则通过描述体现地域性风俗民情的人物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变迁,来反思建国以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曲折道路及其得失,批判极“左”路线的危害和封建文化的痼疾。邓友梅、林希、冯骥才的作品属于另一种类型,他们绘声绘色表现的是清末民初中国古老都市的怪世奇观,观照的是遗老遗少们那没落腐朽者病态、畸形的人生,《那五》

《丑末寅初》《蝓蝓四爷》《三寸金莲》等作品即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刘绍棠与汪曾祺又有所不同,他们的作品以表现得颇为隐曲的人生况味为底色,而呈现一种赞赏讴歌性的价值与情感倾向。汪曾祺以行云流水般的笔致,诗化地表现往昔民间自在、和谐的人生形式和健康、美好的人性品质。刘绍棠则在运河滩爽朗、明快的风情画卷中,展现传统民间野俗的魅力及其道德的光辉。

湖南作家彭见明的创作自成一派。他的《玩古》《风来兮》《天眼》均是通过描述主人公在社会边缘、幽暗处的人生命运,来显示一种有关人生世道的民间智慧和底层品质,同时反观各种时尚性的世相人生,其中既有人情世态审视,又有人生样态展现,还有处世哲学阐释。虽然“民间社会一向是以弱者的形态存在的,它以含垢忍辱的方式来延续和发展自身历史”,但民间的理想和智慧“不是外在于现实生活的理想,它是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乐观主义和对苦难的深刻理解联系在一起”,<sup>[5]</sup>所以,民间的生命行进和生存境界,反而“意味着人类的原始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在一个生命力普遍受到压抑的文明社会里”,<sup>[6]</sup>作者对此进行深入而透彻的审美展示,就使作品有力地建构起一种“道存于民间”“高手在民间”的世道感悟,进而有效地达成了创作主体悲悯当世、以边缘文化资源“拯世”“渡人”的精神意图,这正是长篇小说《天眼》既具审美独特性又具内蕴丰厚度的根本原因。

## 参考文献:

- [1] 唐朝晖.我向往和追求平和的境界——彭见明访谈[J].红豆,2004(7):1-9.
- [2] 刘起林.“边缘叙事”得与失[N].人民日报,2010-07-27(24).
- [3] 雷达.日常性、思考性与精神资源[M]//雷达.雷达自选集·文论卷.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427.
- [4] 彭见明.与一本书有关的事情[J].理论与创作,1999(3):4-7.
- [5]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365-367.
- [6] 陈思和.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M]//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07.

责任编辑:黄声波